



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ese Culture:

A Direct East-West Dialogue

罗素与中华文化

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

丁子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ese Culture:
A Direct East-West Dialogue

罗素与中华文化

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

丁子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丁子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301 - 25513 - 1

I. ①罗… II. ①丁… III. ①罗素, B. (1872 ~1970)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039 号

书 名 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
著作责任者 丁子江 著
组稿编辑 杨书澜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5513 - 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376 千字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自序

“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种经过精心准备的谈话。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别的,那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这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经典训示。读罗素的书就是与一位思想伟人的交谈。

罗素在访华及与中国思想界的对话中,闪现出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瞬间,一簇簇天才的思想火花;这些瞬间和火花,赋予人类一种灿烂的品质,更构成一种永恒的启示。这本书作为《罗素:所有哲学的哲学家》(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的姐妹篇,力图将这些品质和启示,完整地展开在读者面前。

历史语境,是对伟大思想追本溯源的入口。当年那场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与融合,正是发生在中华民族整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拐点。著者曾在浩瀚无际的历史文献中浮沉游弋。本书阐述的罗素思想大都来自英文原作。一则因为虽有不少罗素著述都译成中文,而著者手头并没有那些译本;二则更因为对原文的理解与那些译者有所不同。为撰写本书,著者访问了中美英加四国,包括台湾香港两地不少著名图书馆,查阅了那里大量有关罗素的中英文资料;不仅读过大部分有关罗素的英文传记,而且还查阅了不少英文历史文献作为旁证。一些中华精英与罗素的来往或对其的评述与批判过去是不为常人所知的。著者还探访了罗素活动过的不少地方,找到了不少近乎立体的感觉。不可否认也会有一些资料得自今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若根本忽略这个功能,至少有非与时俱进之嫌,但其最大弊病就是似是而非、难查出处、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因此,必须查证确实来源,方可坦然用之。

为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先简述罗素的生平、成就及主体思想,然后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这位大哲与中国,与当时中华各种精英以及与中华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有着不同的切入点与考证成果:即在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语境还原中重温罗素;分析了这位大哲之

所以有浓厚中国情结的前因后果；还审视了罗素与当时中国三类精英在某种意义上的“对话”：一、文人精英，如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胡适、丁文江、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赵元任、杨端六等；二、政治精英，如孙中山、谭延闿、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张申府等；三、哲学精英，如梁漱溟、张东荪、金岳霖、冯友兰、李石岑、傅铜、张岱年、贺麟、洪谦、任华、沈有鼎、王浩、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勱、徐复观、方东美、殷海光等。除了上述老一代“超级精英”，本书还评述了其他一些后起知名或普通知识分子与罗素的某种“对话”，而这些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资料也是不易挖掘的。本书探讨了罗素的中华文化观，其中包括他对道家、儒家以及佛家的评说，以及他对中国重建的看法等。很多有关这些方面的论述，不仅表现在《中国问题》一书里，而且还藏隐于罗素的其他不少著述中。有一些资料鲜为人知，如当时中国佛教界著名的太虚大师，即吕沛林出国考察讲学时，曾在伦敦与罗素有一次难得而绝佳的东西方直接对话。

罗素祖父，即约翰·罗素对中国的孽债——涉及两次鸦片战争的决策等，亦在本书加以考证，并以此对比来烘托罗素浓郁的中国情结——作为“崇华派”而毕生对这个文明古国的友好；而正是这一点，却为所有罗素研究者所忽略。本书考证了马克思与约翰·罗素的书信来往以及对其评价；还考证了罗素较早系统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主要是来自著名英国汉学家维尔内（E. T. C. Werner）和研究唐诗的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本书首次展示了罗素对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首部小说《目的地：重庆》的评价。此外，本书深入对比了罗素与杜威在几乎同时访华时的不同影响，并以此试图理清当时思想领域中论战的轨迹与张力。著者在罗素浩瀚的英文著述中，查阅到了这位大哲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评价。本书在评析罗素访华重大讲演时，并非简单复述，而是将中文翻译与正式出版的英文著作作了一定的比对，并在与其整体思想的联系中加以把握和解读。本书排查了自1920年以来，罗素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情况。经认真考证，除了提供罗素著作较为完整的列表和罗素生平年表之外，本书还提供了罗素有关中国的部分英文文章列表（1919—1927）、罗素著作的中文译本列表以及罗素访华大事记等。本书英文参考文献名称以及所引用罗素英文著述的出处，都尽量翻译成中文，并标明原文为英文版。本书图文并茂，收集了9张有关罗素及其访华的图片，其中一些

十分罕见。

著者在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一个西方大哲就是罗素。最初是因为这个名字好记、好念。“罗素”的确是一个绝佳的中文译名,“罗”这个姓氏,在中国历史上叫得很响,如“罗成”等;而“素”则是一个意味很深,涵盖颇广的字,如“元素”“因素”“素质”“素性”“素朴”“素材”“素净”等。像很多人一样,知道他是哲学家,并非读他的哲学著作,而是读着他的各种散文体写作走近了他。那时,还没有用“阳光”来形容一类人,如时下流行的“阳光青年”;而在眼前一亮之际,就把“阳光哲学家”的桂冠加在罗素头上。一缕缕智慧、良知与正义的阳光,沿着白纸黑字,落进著者饥渴的灵魂!在迎面而来的人生路标上,总是深深刻着阳光的印记。尽管它并不能将人世间一切阴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无法晒除所有霉菌与腐垢,但却让人感到了人文信念不可扭曲的硬度。再往后,走进“学术”生涯,感到自己就像一块毛坯,不断被罗素的“知识之光”所淬炼。

罗素作为客座教授,在著者所就读和工作过的北京大学进行了近一年的讲学,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罗素回忆说:“我讲课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十分优秀的高等学府。校长与副校长都是热衷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士。”当时罗素在北京的学术讲演,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讲演,大多安排在北京大学;其余较为通俗的课题,则安排在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在任华教授和洪谦教授指导下,著者在北大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罗素。罗素作为访问学者,在著者攻读博士的美国普度大学哲学系作过精彩讲演,至今那里的老教授还记得其中一个题目是“思维的物理条件”,其中谈了他对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的看法;此外在这之前,他还撰文抨击了美国与普度大学所在地印第安纳州的教育制度,因而有人攻击他为“反美主义者”。据他所说: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刚好够躲避私刑”。罗素作为特邀教授,在著者所研读过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举办大型研讨班,吸引了卡尔纳普和莫利斯等人参加;研讨很成功,但罗素不喜欢芝加哥的环境和气候,与那个校长相处得也不很愉快。罗素作为访问学者在著者研读过的美国西北大学哲学系作过讲演,那里产生过好几位罗素研究专家,如主编过研究罗素最重要文献之一《罗素的哲学》一书的谢尔普(P. Schilpp)教授以及对罗素极力推崇的英语专家内瑟考特(A. H. Nethercot)教授等。编辑过《逻辑与知识》等罗素著述的马什(R.

C. Marshi)教授说道:“1944年,西北大学的内瑟考特教授向我推荐了罗素哲学。1951年,我以研究罗素哲学的论文获哈佛博士学位。自那时起,我有幸常同罗素勋爵探讨哲学问题。”罗素在著者目前工作和居住的美国洛杉矶和南加州地区居住了两年,他非常喜欢这个人称天使城之地常年的阳光灿烂。在这里的学术界,他到处留下了活动的痕迹。罗素任客座教授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是本书著者进行学术交流很多的地方。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著者在北大当研究生时,为练习英语,为一位访华美国教授当临时翻译。听说著者正研究罗素,这位教授便兴趣盎然地谈起这位大哲在其所任教的学校,因受迫害而引出的一场举世闻名的大风波。原来她就是来自所谓罗素案件的发源地——纽约市立大学(当时叫纽约市立学院)。对这个案件,著者曾在《罗素:所有哲学的哲学家》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评述过。后来,著者到美国留学后,到纽约拜访这位教授,顺便到这所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学探视了一番。

本书是对罗素这位划时代甚至超时代的思想大师进行阅读、思考和评判后的结果。在著者多年的教研中,罗素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这是因为其智慧、知识、思想、阅历以及人格的巨大张力,无论讨论到什么领域的主题,都能与他的探索和见解挂上钩。自从早年对罗素产生兴趣后,著者曾涉猎了罗素大部分著作,有的是精读,有的是通读,有的是选读,当然还有的只是草草的翻译。

对著者写这本书,有同行朋友劝阻道:在中国,有关罗素的东西已经太多,以致过滥;他名目繁杂的作品可说是翻译最多的之一,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也可说是最常引用的之一,他丰富多彩的生平更可说是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不但是哲学,而且另外不少领域,几乎人人言必称罗素;因此极难写出精彩,写出风格,写出创意,再多出一本,也只会淹没在书海中。

著者还是写了。因为长期的积压,若不加以释放,是一件难以忍受的煎熬。也许写罗素之难,就难在他写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从最技术最枯燥的,一直到最浪漫最奔放的。

在所有的思想家中,罗素恐怕是最多产的。很凑巧,1980年代初,北大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外哲所从事研究,为了练习英语口语,著者利用暑假在国际旅行社当编外导游时,接待过罗素的遗嘱执行律师,他谈了不少

有关这位当事人的著述情况。据他所掌握的数字,罗素共出版过至少 80 部著作以及 5000 多篇各类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私人信件,其中有不少遗失或毁掉。例如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的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去世后,他的夫人根据丈夫遗嘱将所有罗素的来信通通焚烧了。根据著者本人的统计与收集,罗素成书的著作有 97 部(见本书附录“罗素著作列表”),其中《西方哲学史》是 2 卷本,《罗素自传》是 3 卷本,《罗素文集》是 29 卷本,若全部相加就有 129 部。此外还有很多编者根据某种主题而编辑的罗素著作或小册子,就难以计算了。

罗素并非圣贤,当然不会是一个完人,但基本上算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学人,而决非伪君子;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违背自己的理论和学术良知,也从未以标榜自己的所谓道德高尚而刻意掩饰自己对人性弱点的真实体验和揭示;即便是最为“正统”的人士所诟病他的那些有关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主张,也在后来被证实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

“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柏拉图这样告诫世人。

“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英国大哲培根大声疾呼。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开始于感性,然后进入到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没有比理性更高的东西了。”德国大哲康德如此感叹。

自然与人文社会各种领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例如自然科学观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黑洞理论、大爆炸理论、反物质理论等等,最终都成了某种哲学思想的探讨。所有文明和文化历史社会传承中的世界观、科学观、真理观、审美观、价值观、经济观、政治观、法律观、教育观、宗教观、军事观、家庭观等等,都是在思想的高度才得以形成与发展。文明与文明、文化与文化、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不断进行着撞击与融合,最终都以各种形式和维度的“对话”得以互动、共存和发展。

所谓对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几乎所有人类之间任何行为的交往和沟通都是一种广义的“对话”。而只有最终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对话”,才能真正方向明确地引领人类社会;正如孔子所劝诫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如亚里士多德所领悟的:“上帝所做的、胜过一切想象中的幸福行为,莫过于纯粹的思考,而人的行为中最接近这种幸福的东

西,也许是与思考最密切的活动。”每一种文化最高升华的境界就是思想,因此,文化与文化交往与沟通的最高形式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只有对话,才可“化干戈为玉帛”,才可“相逢一笑泯恩仇”,才可“四海一家皆兄弟”!大剧作家萧伯纳笑谈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互相交换,各自得到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互相交换,各自得到两种思想。”这一比喻语调俏皮而意味深长,让人在苹果的清香中嗅到了思想的浓郁。思想互换的收获与其他任何互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就是大哲罗素与中华文化所进行的一场思想与思想的互换与对话。

读罗素一类哲学大师的意义远远超出哲学范畴。人类存在的所有特点,都可以从阅读中领悟;人类全部的思想精华,都对读者无限敞开;大师们指向的精神高度,能使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跃起、上升,点燃信念之灯,照亮深邃的生命。然而,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习惯中,阅读大哲并不普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一年平均每人是 64 本。上海在中国排名第一,只有 8 本。而中国 13 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1 本都不到。也就是说,犹太人平均读书量是中国人的 64 倍。这种持久的忽视,更使著者本人在埋头于本书写作时感到来自内心深处的催促。但愿这种催促能够企及更多的人,能够在阅读的荒原上点亮星星之火。如果可能,每个试图了解有关大哲的人只读一遍,星星之火,也就有了燎原之势。

著者本意不想把此书写成枯燥无味的纯学术论著,也不想无原则地追求市场效应。因此,希望本书能“深者见深浅者见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雅者见雅俗者见俗”。但倘若罗素特定的生平与思想,让人产生“道者见道淫者见淫”,那也是无奈之事,并非著者所愿。基于上述考虑,本书为观点与材料的结合,强调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寓学术性于趣味性,达到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双轨功能。先将大哲罗素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人,再上升到思想巨匠的高度,尽可能立体和全方位地揭示思想伟人的经历、阅历以及精神生活发展的各个宏观与微观层面。顺便提及,本书每一章前面所引罗素名言,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才能理解,否则就有断章取义之误导。

丁子江

2014 年 9 月

目 录

导言 在东西方对话的历史语境中重温罗素	1
一、罗素的访华语境:东西方跨文化直接 对话的沟通基础	4
二、罗素的访华语境:特定社会历史文化 的全方位还原	10
三、罗素的访华语境:跨文化的“最大公约数” 与“不可翻译性”	12
四、罗素的访华语境:跨文化“自我反思” 的挑战	16
五、罗素的访华语境:跨文化对话的桥梁 设计者与构筑者	21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博学的思想大师	25
一、精彩纷呈的一生	26
二、跨学科与跨文化的一代大哲	33
第二章 终生的中国情结	45
一、与中国不解之缘的“暗结”	45
二、热情的“崇华派”:大哲难忘的中国之恋	58
第三章 罗素与中华文人精英	74
一、罗素与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蒋梦麟	75
二、罗素与胡适、丁文江	81

三、罗素与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	86
四、罗素与赵元任、杨端六	94
五、罗素与其他文人精英	104
第四章 罗素与中华政治精英	112
一、罗素与孙中山、谭延闿	114
二、罗素与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	119
三、罗素与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张国焘	123
四、罗素与张申府	127
第五章 罗素与中华哲学精英	135
一、罗素与梁漱溟	136
二、罗素与张东荪、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 李石岑、傅铜	144
三、罗素与张岱年、贺麟	159
四、罗素与洪谦、任华、沈有鼎、王浩	162
五、罗素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方东美	176
六、罗素与其他哲学精英	185
第六章 罗素的重大讲演及其影响	187
一、第一大演讲《哲学问题》	190
二、第二大演讲《心之分析》	202
三、第三大演讲《物之分析》	207
四、第四大演讲《社会结构学》	212
五、第五大演讲“数理逻辑”	217
六、临别讲演“中国的到自由之路”	222
第七章 罗素：一位了解中华文化的大哲	225
一、罗素的中华文化观	226
二、罗素的中国重建观	246
第八章 1920 年代中国的“罗素化”与“杜威化”	260
一、“罗素化”与“杜威化”的区别	261
二、“罗素化”与“杜威化”的“失利” 与“复兴”	279

第九章 悲情历史的承载:罗素祖孙与中国的不同“对话”	285
一、约翰·罗素:两次鸦片战争 的重要决策者	285
二、伯特兰·罗素对鸦片战争的批判	301
第十章 罗素非凡的写作及其著作中译本	305
一、因思想著述和优美写作而获 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哲	305
二、罗素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概况	310
后记 在大师遨游的历史时空穿越	319
参考文献	323
罗素著作列表	333
罗素有关中国的部分英文文章列表(1919—1927)	337
罗素著作中文译本列表	340
罗素访华大事记	348
罗素生平年表	350

导言 在东西方对话的历史 语境中重温罗素

我认为,为了使我们这个醉醺醺的时代恢复清醒,历史学可以起到一种重大的作用。我不是说这应该由任何一种假定的“历史教训”,或者由任何一种易于用某种言语公式表述的东西来实现。历史学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不仅是要为历史学家们而且要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和感觉方式。——罗素^①

“所有真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哲学大师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给人类留下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②对此虽有争议,但从历史的延续性角度说,自有其高超的道理。重温历史,那场由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引发的东西方思想对话,曾闹得轰轰烈烈,对今天的中华崛起仍有着现实的意义,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的:“罗素于20世纪秋访问中国,并在那里停留了近一年时间,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显示了东西方之间的碰撞。”^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素的访华,是现代东西方思想直接对话的一次伟大尝试。若要充分了解这场亘古未有的对话,最好先将其置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特定语境中,再来展开我们的比较与审思。西方有一些学者就注重影响罗素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语境问题。钱穆(1895—1990)在谈历史作用时指出:“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

① 罗素:《论历史》,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

② Croce, Benedetto: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lated by Douglas Ainsli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p. 12.

③ Suzanne P. Ogden. 1982. “The Sage in the Inkpot: 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a’s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6, No. 4, 1982, p. 529.

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①

1928年,号称“20世纪最伟大经验主义哲学家”^②的莱辛巴赫(H. Reichenbach, 1891—1953)曾指出:“罗素令人惊叹地将数理逻辑与和平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相结合,但对这一点,人们若审视他的心理根源就可以理解。他准备推翻逻辑上的陈旧传统,同时用更多的资产阶级自由,来揭露古代理念的虚幻特征;并且毫无畏惧地摒弃那些过时的价值观。”^③这也是为什么罗素在访华时受到盛况空前欢迎的原因之一。由于在逻辑与认识论上的非凡建树,在当时的中国,罗素已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④。有学者认为,在访华时,罗素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的声名,十分有助于提高他的社会政治观的可信度。实际上,罗素在这之前出版的一些著述,如《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1919年)、《社会重建的原理》(1916)等,已经在欧洲引起广泛的反响。^⑤

与几乎同期访华的杜威一样,罗素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空前的,尽管不一定是绝后的;但历数访华过的西方哲人或著名学者,至今还没有哪一位能达到这种热烈程度。这种“空前”至少表现在:一、除了杜威,在罗素之前,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重要西方哲学家或著名学者(传教士除外)来过中国;^⑥二、综合来说,当时罗素的博学智慧与文理皆通的学术造诣、思想的敏锐与丰富的阅历、人格的力量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堪称举世无双;三、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社会转型与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动乱暂停百废待兴而相对和平发展的短暂阶段,思想文化界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1页。

② Salmon, W., 1977a,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in Reichenbach (1977a), Volume 1.

③ H. Reichenbach. 1928. "An Early Appreciation." In R. Shoenman (ed) *Bertrand Russell: Philosophy of the Century*, Boston 1967, p. 133.

④ Chu Shih-ying. 1921. "Russell." *The Russell Monthly*. January 1921. p. 1.

⑤ S. P. Ogden. 1982. "The Sage in the Inkpot: 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a's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16, 4, 1982, pp. 529—600.

⑥ 在中国历史上,西方传教士曾不断来华传教,如利玛窦(1552—1610)于1583年进入中国,此后一直在华居住。他与中国最早的“大学”——白鹿洞书院的学人们开创了直接思想对话,并后来与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利玛窦等无疑对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大影响,但他毕竟是因来华以后的活动而历史留名;而不像罗素在来华之前就已经名扬世界,并在中国最根本的社会转型期进行了颇具规模和影响巨大的东西方对话。

和知识分子的理性、求知、包容、活跃,科学态度以及追求真理和批判探索的精神是古今未有的;四、罗素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10个多月中,作过大量的讲演,也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接触,特撰写了《中国问题》这一专著,并在后来的各种著作和场合经常提及中国,以致形成了独到的中国观与难以忘怀的中国情结。大哲罗素与中华文化难以割舍的关系,正是形成于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即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刚刚发生的时期。

什么是罗素访华时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语境?有西方学者对此评析道:“从政治上说,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年代。被罗素与英国1868年光荣革命相提并论的辛亥革命,从理论上说,使这个国家成为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形态,但实际上,它变成了权力真空的状态。在孙中山领导下带有温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国民党,正是罗素和杜威所希望获胜的力量。尽管为毛泽东等所质疑,但在1920年的中国,也存在着以非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学生与政治进步分子中,出现了一种强烈而广泛的要求,即渴望某种新的政治哲学。尽管有不少人试图采取苏俄式的方式,但仍有很多人来听罗素的讲演,希望这位《社会重建的原理》与《自由之路》的作者,能提供可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相竞争的学说。”^①可以说,尽管也许有些偏见,但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看法。就在杜威刚到中国不久,就有中国学者欢呼道:“我们在国内的人,居然有机会把世界第一流的学者请了来,听他的言论,接近他的声音笑貌,这样的幸福是不容易得的。他所说的,我们多数人或者未必全能领会和了解,但在‘观感之间’所得到的,也就不少了。……这时候有一个大家尊仰的‘论师’在我们中间,新思想就得了一个很好的指导,很有力的兴奋。顽固的人,能听听这样名哲的议论,或者能受些感化,换些新空气,也未可知。”^②有学者评述道:“1919—1924年,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有五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他们分别来自美、英、德、印四个国家。每人讲学时间不等,长者两年多,短者数月。主办者为此作了精心的组织与宣传:每位开讲之前,都安排中国学者介绍其学说梗概,预为铺垫;组织大江南北巡回演讲,配以高手翻译,场场爆满;媒体全程报道,许多报纸杂志都辟有专栏与专号;讲演中译稿

① Ray Monk. 1996. *Bertrand Russell: The Spirit of Solitude, 1872—1921*, Volume 1. The Free Press, p. 592.

② 《美国教育者杜威》,《晨报》1919年5月14日,第7版。

不仅全文刊发,且迅速结集出版,各地热销。因之,讲学一时风行海内,盛况空前。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每年都有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在华讲学,每年都在学界与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热点;每位学者的影响自有不同,但作为整体,却构成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景观。”^①

一、罗素的访华语境:东西方跨文化 直接对话的沟通基础

东西方对话的研究应当考虑四个方面:语境化、翻译化、评估化与应用化。^②我们对罗素의思想和著述也应当考虑这四个方面。在传统文化又在多元化跨文化背景下,除了人类的共同性,罗素所作的东西方对话还体现了两种特性,即历史文化的偶然性与哲学语境的特殊性。一个类似但更复杂哲学反思的背景就是在现实社会。在全球化趋势中,各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既表现为同质性(homogeneity),也表现为异质性(heterogeneity)。

语境,从中文译名讲,顾名思义就是语言形式产生的环境。狭义而通俗地说,语境就是指口头说话交流中的前言后语,或书面写作表达中的上下文联系。所谓语境,实际上可看作语言的文化背景、历史传承、时空环境、心理诉求以及情绪景象等。语境有两种功能:其一,它能将语言符号的原本多义性转为单义性;其二,它又能从原本语言符号衍生出更多的歧义。由于语言符号本身包含两种实际含义,即赋予义和解释义,并由此产生的语境意义甚至可超越语言符号本初的意义,而主导人类的交往与沟通。除此之外,语境也影响着交往主体,即使用者对语言符号的选择与演绎。语境是构成语言表达与交流的主客观环境或因素。客观性因素有时间、空间、场景、对象、人事、社会关系、论题焦点等所有可能的外在条件;主观性因素有思想、理念、性格、职业、修养、家教、处境、心情等所有可能的主体内在条件。为便于理解,语境也可分为狭义语境与广义语境两类。

^① 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Don Garrest. 2004. "Philosophy and History in Modern Philosophy," *The Future for Philosophy*, ed Brian Lei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9.

从规范的角度看,比较法作为一种工具,对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分类以及是否存在共有的现象,可用同样原因加以解释。对于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比较法为探究和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越来越强化地作为一种有效手段,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的社会及其结构。尤其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伴随着跨学科和社会科学网络与国际合作而得到。在一定意义上,罗素早在90多年前就使用了这些手段。对他来说,比较研究的重点已从先前单纯描述性的、普遍性的和“免除文化(culture-free)”的研究转变为对社会现象的研究。社会方式曾在现代工业社会学所揭示的各种关系中得到充分的阐释,^①这也意味着,在访华时,作为现代西方“思想代表”的罗素已经试图在不同的而且更广泛的社会语境(the social context)中,掌控社会规范和制度结构的特殊性,并寻求在更广泛社会语境中的差异性。在东西方比较研究中,对语境化更加强调的另一个结果是,其具备了越来越多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性质,因为在尽可能低的分解(disaggregation)中,必须考虑更大范围的多种因素。罗素访华时所作的近20次的各种讲演以及后来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述,都是在跨文化和跨学科语境的对话以及比较研究中进行的,涉及了科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伦理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等几乎一切重要的领域。

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可谓语境说的始作俑者。1923年,也就是罗素访华后的两年,马林诺斯基曾将语境分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与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或语言性语境与社会性语境(非语言语境)两大类。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在整个文化语境的每一个方面,对民族地理的研究以及理论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它的主要兴趣是将文化当成一种普遍现象来加以研究,并在特定文化的研究中发展一种方法论框架,其中包括语境学说,并开辟了跨文化比较的系统研究。他强烈反对脱离文化语境的各种理论思潮。^②

① 参见 Maurice, M., Sellier, F. and Silvestre, J.-J. 1986.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Power: A Comparison of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② Bronislaw Malinowski. *Anthropology*. Supplementary volume 1, pp. 131—140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3th ed. Chicago: Benton, 1926; *Social Anthropology*. Volume 20, pp. 862—870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 Chicago: Benton, 1929; *Culture*. Volume 4, pp. 621—645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31.